

陈翰笙与中国土地革命和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张 丽 李 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土地革命的成功不光有赖于红区红色政权的实践,而且有赖于白区中共地下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宣传。在论述和倡导土地革命必要性的理论宣传中,生活在白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派知识分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29-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是中共白区地下党员联合左翼学者试图为中共土地革命进行理论论证的第一次学术努力。此次调查为后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杂志在对土地革命的理论论证和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对“无、保调查”的历史背景,其与中共和中共土地革命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查资料的质量和学术性进行评述,并试图对1958年张之毅等人的“趋中化”资料分析结果进行解释。

【关键词】社会性质;土地革命;无保调查;学术性;趋中化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9)03-0085-11

Chen Hans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Land Revolution, and the Wuxi-Baoding Rural Survey

ZHANG Li LI K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Beijing 100191)

Abstract: Land revolution was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he success of the land revolution was attributed not only to its implementation by the communists in the regions controlled by the CCP, but also the advocacy for land revolution by underground CCP and leftist scholars in regions governed by the KMD. The 1929-1930 Wuxi-Baoding rural survey was the first academic effort made by the underground CCP to argue for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operation of the survey paved the way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journal Rural China, which were operat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CP,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ocacy and drawing support from Chinese intellectuals for land revolu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uxi-Baoding surveys, and also discusses the academic quality of the surveys and provide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surprising 1958 analysis result of “qu-zhong-hua” (land ownership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Key words: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 land revolution; Wuxi-Baoding survey; academic quality of survey data; “qu-zhong-hua”

【收稿日期】 2019-03-20

【作者简介】 张丽 (1959-), 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经济史与广义虚拟经济;
李坤 (1989-),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经济史和广义虚拟经济。

一、中国近代农村土地问题

20世纪上半叶,“土地改革”曾是国共两党共同倡导的政治主张和口号;这一现象不仅说明当时的国共两党都已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在另一方面也说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土地问题日趋严重的主流观点已经相当深入人心,以至于不光共产党,就是国民党也不得不真真假假地提出“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口号来。今天看来,当时这一社会主流言论的形成很难说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无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白区工作的众多地下中共党员学者和党外左翼学者主导和推动了这一社会主流观点的形成^①。

(一)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作出了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两个决议。在“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②,并将“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③。

根据李洪岩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首发于列宁。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性,又在7月26日的报告中,提到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然而,列宁对他的提法,特别是“半封建”的提法,并没有展开详细深入的讨论,以致于在后来的几年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并没有一个统一清晰的定义。这也为列宁逝世后,托洛斯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针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激烈理论交锋埋下了伏笔。

从1927到1928年,斯大林和布哈林俩人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观点逐渐趋于统一;斯大林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理论观点也渐进成熟。1928年2月25日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反对外国资本的压迫,消灭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中那些资本主义前的半封建关系的残余”。这个决议为莫斯科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理论交锋画上句号,也为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将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定下了基调^④。

(二)半封建性下的土地革命必要性的论证

中共六大正式将中国近代社会定性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并将“土地革命”确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这就使得从理论上证明中国农村社会的半封建性显得尤为重要,不光是因为“半封建性”曾经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党内长期以来颇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对中国农村“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论证就是对中国实行“土地革命必要性”的论证。如果像托派所言,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那么土地革命便没有必要;而如果承认卜凯等人,以及乡村改良主义者的观点——前者为技术派,认为中国近代农村问题是土地、人口和技术等生产力因素的问题;后者为改良派,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源于农民之缺乏教育(晏阳初)和农民之缺乏组织、秩序和合作(梁漱溟)——那

①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86、1989年。

② 据李洪岩的研究,中共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字样是在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国际评论》创刊号的发刊词上。参见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③ “中共六大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第19—33页;同时,参见书中陈翰笙“序”和薛暮桥“序”。

④ 李洪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么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教育、建立合作组织等,而不是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

可以判断,六大会议后,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理论任务。这一点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也都可以得到证实。正如陈翰笙先生和薛暮桥先生在他们为《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所做的序中所说: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土地革命是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中心问题,从此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农民和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为了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党内左倾和右倾错误,保证新民主主义的胜利进行,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调查和研究农民和土地问题……^①

六大之后,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根据地发布了许多土地革命的法令和论述土地革命的文献。在白区,也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讨论农村经济问题,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农村经济调查,同帝国主义学者(以卜凯为代表)和托派分子,乡村改良主义分子等等进行论争。^②

可以说,“1929-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二、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及其资料

(一)1929-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

1929年和1930年,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1898-2004)和所员王寅生(1912-1956)的组织和主持下^③,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社会上的一些农村工作者和学者分别于1929

① 陈翰笙:《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② 薛暮桥:《序》,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

③ 陈翰笙和王寅生是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物。陈翰笙是调查的发起者,王寅生是调查的实际负责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公开资料中,翰老的入党时间一直被定格在1935年。1986-1991年,在和笔者的聊天中,翰老几次提到,他其实早在1926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李大钊,但从已出版的历史资料来看,一直到1935年翰老在莫斯科经王明和康生介绍转入到中国共产党后,翰老才开始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关于翰老1926-1935年间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的经历,一直到1980年,翰老才在自己的干部履历表上给第一次填上,之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35页)。由此推断,一直到1980年,中共党组织并不知道翰老当初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秘密工作者的身份。关于王寅生的身份,在现有出版的各种资料中,除《中国农村》中有一句提到王寅生于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365页),其它资料均无任何关于王寅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记录。从王寅生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以及在中共秘密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中国农村”杂志中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上看,还有从他曾先后介绍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等人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工作,以后又不断介绍左派学者加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及在1943年《中国农村》在广西桂林被迫停刊,“研究会”转移重庆后,他又担任由李紫翔(1923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主笔的重庆“商务日报”上的双周刊《中国农村》主编的经历(参见孙晓村:《悼念王寅生同志》,《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王易今:“深切怀念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2-13页;方悻农:“他指引我走上正确的道路”,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47页)上推理,很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初的王寅生不是中共党员。本文认为关于王寅生的身份和经历有待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或更多档案资料的发现。

年7-9月对无锡农村的22个村庄和1930年6-8月对保定农村的11个村庄进行了实地调查。根据笔者1986-1991年间对陈翰笙先生的几次访谈,导致这次调查的最初想法萌生于1928年陈翰笙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期间与第三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农村问题专家马季亚尔的一场争论。

根据翰老的陈述,1928年在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的马季亚尔在莫斯科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农村经济》,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陈翰笙不同意马季亚尔的观点,认为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而且这也是当时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这次争论使陈翰笙萌生了要进行农村调查,以实际调查数据论证中国农村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想法。

1928年5月陈翰笙回国,并于1929年2月受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在“回忆王寅生同志”一文中写道,他到研究所上任后,便邀请他当年在北大教书时的学生王寅生也来所工作;王寅生到所后,又先后协助他物色了几位其他同志^①,如钱俊瑞、张锡昌、石凯福(薛樵)和薛暮桥等^②。钱俊瑞于1929年经王寅生介绍入所,参加了无锡、保定的整个调查;张锡昌1930年6月入所,参加了保定调查;薛暮桥1932年初入所,参加了无锡、保定调查资料的整理。根据陈翰笙的陈述,无锡调查团45人,王寅生是调查团的实际负责人,“常驻无锡,主持其事”;调查团分为四个调查组,分别由张稼夫、钱俊瑞、刘端生、秦柳方担任组长^③。

这次调查是以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的,但从调查主持者和调查骨干人员的身份背景上看,实际上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1928年2月莫斯科通过《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7月“中共六大”通过“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把中国社会性质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把土地革命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后,为中共土地革命寻找理论依据的一个调查。

当时,陈翰笙是共产国际的地下工作者;王寅生从1923年起便在北大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后又与陈翰笙、高仁山和冯雪峰等人关系密切,多次掩护革命党人,并在1927年10月遭到逮捕,2个月后才在亲戚的保释下被放出狱^④。四位调查组组长中,张稼夫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便开始投身社会革命,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1929年被党组织特派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担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⑤;秦柳方此时也已是中共地下党员(1927年1月入党)^⑥;钱俊瑞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左翼学者,并在参加了无锡、保定调查,和在研究所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成为了一位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参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杂志的创建和运行工作,为宣传土地革命辛勤笔耕,并在1935年加入共产党,后又参加新四军,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的忠诚共产党人^⑦;刘端生因1938年病逝,所以关于他的历史资料很少,但从他在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后,继续与中共地下党员薛暮桥一同到广西做农村调查的经历看,其至少是一位左翼学

① 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② 陈翰笙在回忆中说王寅生帮他物色了几位同志入所,但没有给出人员名单;秦柳方在回忆中提到王寅生介绍钱俊瑞、张锡昌和石凯福(薛樵)到研究所工作,参见秦柳方:《千淘万漉,缜密调查——王寅生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3页;薛暮桥在回忆录中提到王寅生等给他来信,邀请他到研究所工作,参见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③ 陈翰笙:《回忆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页。

④ 秦柳方:《千淘万漉,缜密调查——王寅生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81-83页。

⑤ 张国富:《三晋骄子张稼夫》,《党史文汇》,2015年第1期。

⑥ 王易今、余立:《深思和勤奋——秦柳方传略》,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⑦ 秦柳方:《勤奋的学者,忠诚的战士——回忆钱俊瑞同志》,秦柳方主编:《云海滴翠》,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0-46页。

者。至此,我们可以说,1929-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并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中诞生的左翼学者调查,从始至终都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中共地下党员的积极参与^①。这一点,钱俊瑞在其回忆文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中曾明确指出:“1929到1933年,领导我们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张稼夫。”^②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目的是要用实际调查数据论证中国农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进而论证中国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由于土地关系是封建社会性质的主要表现方式,所以土地关系是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这次调查采用了阶级划分法,将农户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和其他几个阶层。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并没有就此而止,而是继续推动白区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学者对土地革命的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12月,在陈翰笙牵头组织,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等人的实际运作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次年(1934)10月,《中国农村》杂志也在上海以学术期刊的名义正式出版发行,由薛暮桥(地下党员)任主编,而当年参加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很多骨干人员此时又成为了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骨干成员和《中国农村》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同无锡、保定农村调查颇为异曲同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杂志在名义上也都是已向国民党政府注册立案的学术组织和杂志,但实际上完全是在中共的秘密领导下运作。对此,钱俊瑞曾在其回忆文章中明确说道: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1929到1933年,领导我们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是张稼夫。1933年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后,我们是在党的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工作的。1934年文总书记是胡乔木,我是宣传文员。……中央文委领导“文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文总”领导下工作,由我负责联系。^③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七人组成理事会,公推陈翰笙担任主席,争取和团结了一些党外人士,组成领导机构。主要由党外人士出面,同我们一起来搞,党员则负责实际工作,不大露面。这是为了在当时上海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使我们的工作便于开展。我们的经费自始至终除由会员交纳会费,以及以稿费收入抵补外,一直由部分会员以月捐方式承担。……农研会成立以后,即着手出版一个定期刊物,这就是《中国农村》。^④

《中国农村》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平台,而“衰退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地权日益向少数人手中集中;土地关系日趋恶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沦落为雇农或农业工人或被迫离开农业而到城市谋生^⑤。从1934年10月在上海创刊到1943年6月被国民党

① 1986年笔者和朱文强、崔晓黎、李文英等人到河北保定清苑县东顾庄调查时,村里的一些老人告诉我们当时到他们村里调查的一些人曾秘密地问他们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②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③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④ 钱俊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前后》(1981年11月),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19页。

⑤ 特别参见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分别于1985、1986、1989出版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1-3辑;冯和法1933年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1935年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范苑声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研究》;金轮海1937年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千家驹1935年的《农村与都市》;钱亦石1935年的《中国农村问题》;孙建1989年的《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岳琛1989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史》;章有义1957年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等。

在广西桂林禁刊,然后从桂林转移到重庆《商务日报》上出版副刊,再到抗战胜利后,重新回到上海在《文汇报》上以副刊形式出现,直到1947年5月19日随《文汇报》一起被封刊为止^①,《中国农村》积极配合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革命进行舆论上的宣传和准备工作。可以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在理论论证和舆论宣传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土地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鉴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杂志已经完成了它们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宣告解散,《中国农村》杂志正式停刊。

(二)1958年的无锡、保定农村调查

20世纪50年代,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比较新旧社会的利弊,阐述和宣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决定对1929年无锡22个村庄调查中的11个村庄和1930年保定调查的11个村庄再进行一次调查。

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实际调查数据,对解放前后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进行对比,旨在论证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解放了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在1958年的调查中,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的研究人员不仅调查了1957年的农户经济状况,同时还对保定11个调查村1936、1946年的农户经济状况和无锡11个调查村1936、1948、1952年的农户经济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从而使无锡的11个村庄拥有了五个年头的调查数据(1929、1936、1948、1952和1957),保定的11个村庄拥有了四个年头的调查数据(1930、1936、1946、1957)。1958年的农户家庭经济调查表是在1929年的农户经济调查表的基础上设计的,但是在调查指标的数量上远少于1929年。1929年的调查有500多个调查指标,而1958年的调查只保留了1929年500多个调查指标中的164项。然而,尽管调查指标数量减少了,1958年的164项指标几乎囊括了农户家庭经济活动的所有信息。

两次“无、保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原始调查资料和数据。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尽管参加“1929—1930年无锡、保定调查”的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学者和左翼学者后来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讨论中国近代农村的土地关系问题,强调农村土地问题的严重性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但利用无锡、保定调查资料对两地的土地关系予以数据上分析,用之论证自己观点的文章很少,只有陈翰笙在1934年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中采用了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资料^②。

(三)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的学术性

根据1957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关于1929—1930年无锡、保定调查的文字资料,1929—1930年的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两个决议——“土地问题决议”和“农民问题决议”密切相关。调查的目的主要是要用实际调查资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进而论证在中国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③,并“对当时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御用学者、各派改良主义者以及托派分子反对中国土地革命的反动论点进行有力的驳斥。”^④

鉴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政治倾向性,不少学者都曾一度对“无、保调查”资料的翔实性抱有过怀疑的态度。其实,在政治无处不在的社会中,哪里有没有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社会科学学者?也极少有不带政治倾向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本文认为决定学术研究质量的更多的应该是学者的学术品格和学风而不是学者的政治倾向。

① 参见王易今:《深切怀念王寅生同志》,王寅生:《王寅生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8—11页。

② 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合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中国展望出版社,第80—93页。

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绪论)》,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1—2页。

④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方案(初稿)》,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1页。

针对1929-1930年“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笔者(作者之一张丽)曾几次向陈翰笙先生请教。1986年12月,笔者首次向陈老提及这个问题。陈老当时否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反而特别强调了1929-1930年无锡、保定调查的学术性,指出那些主持和参加调查的很多人是学者;他们虽然信仰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他们也是严肃的学者^①。

1991年2月4日,笔者在陈老面前再次提到“无保调查”与中共六大决议(土地问题决议)之间的关系问题。陈老再一次强调了两次调查的学术性。他说这些学者信奉马列主义;他们在思想感情上接近中国共产党,信仰上与中国共产党相一致;尽管调查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但他们是严肃的学者;他们不是要制造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是要在实践中证实自己的观点;他们真心相信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并力求通过认真、扎实的实地调查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因此,在整个调查的设计和进行中,他们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②。

正如陈老所说,后来在对“无保调查”资料的整理中,笔者从那些原始调查表和1958年誊录出来的大量卡片中见证了当年那些学者严肃、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毫无疑问,1929-1930年还有1958年的无锡保定调查都是非常高质量的调查。从指标的设计到调查的执行都做得非常严谨认真。1929年的无锡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从1929年7月初开始到9月底结束。调查团由调查员和办事员45人组成,分为4组,总部设在无锡县城内。当时选了9个普通村,13个特殊村;调查人员对22个村实行了挨户调查,共计1207户,又择其附近55个村和8个市镇进行了概况调查。

当时之所以选择无锡和保定,是因为二者都是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影响较大,与国内外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商品经济较为发达,比较能反映出半殖民地经济特点的地区。前者邻近上海,是宁沪铁路之间的中转站,不光水陆交通发达,其自身市镇的工商业也很发达。后者近北京天津,是京汉铁路的中转站;东有水路可通天津,北有铁路可通北京、内蒙和东北,西有铁路可通山西。保定虽不如无锡经济发达,但也是一个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是中国北方近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影响下农村经济变化较大的一个地区。两个地区分别代表着中国南北两地农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地区。当时主持“无保调查”的陈翰笙等人认为,如果连无锡和保定两地农村的农业生产关系都是封建性质的,那么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③。

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是,1958年,张之毅等学者对1929-1930年和1958年两次无锡保定农村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但分析结果却显示在土改前的近20年中,无锡、保定两地的土地关系变化趋势竟然都是“趋中化”,即地主、富农和贫农的户数比例在减少,中农的户数比例却在增加。其间,地主、富农下降为中农的户数远大于中农上升为地主、富农的户数,而上升为中农的贫农户数又大于中农下降为贫农的户数。

这样的结果显然难以支持解放前中国农村土地越来越集中,经济矛盾日趋尖锐的观点。而且,这种分析结果如果被人引用并得出解放前中国农村阶级矛盾缓和的结论来,无疑将不利于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为此,孙冶方曾特意写信给薛暮桥等人商洽,并写信给无锡保定两地的统计局局长等人,请求对调查数据予以详细地核对检查,其中特别要求对调查中的阶级成分划分情况进行重新检查审议^④。然而,这个事情本身其实正恰恰说明了实际调查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① 摘自本文第一作者张丽当年的访谈笔记。

② 摘自本文第一作者张丽当年的访谈笔记。

③ 参见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近三十年来无锡保定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绪论)》,内部印刷资料,1958年,第5-10页。

④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孙冶方致李、袁、史局长的信”;“孙冶方致文浩、虚哲的信”;“孙冶方致薛暮桥、思华等人的信”;1958年10月,内部印刷资料。

三、无锡保定农村土地关系的“趋中化”及其解释

1958年,张之毅等人对“无保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却出乎意外地发现1929—1948年的无锡和1930—1946年的保定,其土地关系情况竟出现了地主、富农和贫农户数比例下降,中农户数比例上升的“趋中化”现象。而笔者根据无锡农村调查资料对无锡11调查村1929—1948年间土地出租状况和地租率变化的研究分析也显示了出乎意料的结果。1929年至1948年无锡农村的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均呈下降趋势。1929年,11村出租土地占有所有土地的49.31%,地租占收成的38.77%。1936年,土地出租率45.83%,地租率34.38%。1948年,土地出租率37.14%,地租率33.32%。土地出租率从1929到1948年呈明显下降趋势;1929—1936年,年平均下降率1.05%;1936—1948年,年平均下降率1.77%;整个时期年平均下降率1.50%。地租率从1929年到1936年下降明显,年平均下降率1.73%;但从1936至1948年,下降趋势并不明显,年平均下降率只有0.26%;整个时期,年平均下降率0.80%^①。

这些分析结果与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土地关系持续恶化,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呈普遍上升趋势的主流观点甚为不同。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解读这些不同呢?

当时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土地租佃与农业雇工。地主完全靠出租土地和雇工生活;富农虽然耕种一小部分土地,但主要靠出租和雇工生活;中农基本上是自耕农,既不出租土地和雇佣农工,也不承租土地和当农业雇工;贫农自己拥有一点儿土地,但主要靠租种土地或出卖农业劳动力生活;而佃农或雇农则完全是靠租种土地和出卖农业劳动力为生。由于地主与富农的成分区别在于是否完全靠出租土地和雇佣农工生活,富农与中农的成分区别在于是否有土地租佃与农业雇工,即有没有通过出租土地和雇佣农工剥削他人,而中农与贫农的成分区别在于是否通过租种土地和当农业雇工被他人剥削,那么所谓的“地主富农和贫农户数比例下降,中农户数比例上升的趋中化”现象,其实就是农村出租和租佃土地,雇佣农工和出雇做农工的农户少了。这个结果与笔者关于1929—1948年无锡土地出租率下降的研究结果其实是一致的,因为当农村出租土地和租佃土地的农户减少时,土地的出租率自然就会下降。

本文认为阶级结构的“中农化”或“趋中化”可以说明农村中有出租和租佃,雇工和出雇的农户少了,但其并不一定意味着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它既可以被理解为阶级矛盾缓和,农民整体的平均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可以被理解为整个农村各个阶级的境况都不好,农民整体的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了。在张之毅等人对无锡调查资料的分析中,一方面是贫农上升为中农的户数多于中农下降为贫农的户数,另一方面又是地主、富农下降为中农的户数多于中农上升为地主、富农的户数。这就增加了“到底是生活水平上升还是生活水平下降”的判断难度。

如果仅从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变化来看,近代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大可能有什么提高的。相反,其还会由于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而有所下降。根据以往的研究,从19世纪90年代到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全国人口大约增长了22%~30%,农业人口增加21%^②,耕地面积增

^① 张丽:《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9—270页。

^② 根据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19世纪90年代全国人口3.8—3.9亿,1936年4.7亿多(参见:《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4页,表44;第482页,表76);根据珀金斯的修正数据,1893年全国人口3.85亿,1933年5亿(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93年到1933年农村人口增长21%(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907页)。

加0%—18%^①,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则变化不大^②。从这些数据来看,如果单从粮食生产的角度,近代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是下降的。然而,如果考虑到农村的农业商品化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某些个时间段有可能又是上升的。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由于国外市场对中国生丝、茶叶、大豆等经济作物产品的格外需求,部分农村地区却又的确有过一段农民收入增加的繁荣时期。只是这种繁荣很短暂,并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而且一些地区农民收入的暂时增加还是以资源流失和土地肥力的下降为代价的^③。

在笔者对1929—1948年间无锡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变化的研究中,导致无锡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④。而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也可以解释张之毅等人“趋中化”现象中的部分现象。就无锡来说,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导致了无锡农村原本需要承租土地和出雇为农工的贫、雇农户数的下降,其结果自然是中农户数的增多;但也导致了原本不需要但后来却需要出租土地和雇佣农工的户数的增多,其结果自然是一部分中农上升为富农。中农本不需要出租土地和雇佣农工,但由于一部分家庭劳动力进城工作,所以也开始出租部分土地和雇佣一定的农工,成分便因之由中农上升为富农;而贫农本来主要靠租种土地和做农工生活,但由于一部分家庭劳动力到城市工作,所以便不再需要租种土地和做农工,其成分便由贫农上升为中农。

如果从无锡农村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这几个阶层来看(参见表1),1929年,雇农和地主两个阶层劳动力进城的比例最高,可以解释为早期时主要是有钱到城里投资的地主和在农村没有土地的雇农对城市比较感兴趣。从1929年到1936年到1948年,雇农劳动力进城的比例逐渐降低,到1936年和1948年时已是所有阶层中劳动力进城比例最低的。笔者的解释是与中农和贫农相比,雇农可能是最早被吸引去到城市谋生的,到1948年时能出去的雇农估计都已经全出去了,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想去而没有条件去的。

1929年和1936年,贫农家庭中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比例要比中农和富农都高,但是到了1948年中农阶层的劳动力转移比例便远远高于贫农。其一方面可以解释为随着上海和无锡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劳动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城市里对中农阶层有吸引力的工作也越来越多;其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艰难,连中农阶层也开始寻求城市就业。从1929年到1948年,整个时期里富农阶层的劳动力转移比例一直很低,说明富农这个阶层是当时农村里最缺少驱动力寻求城市就业的阶层。其既不像雇农、贫农和中农那样容易被城市较高的收入所吸引或不得不寻求城市就业,也不像地主阶层那样有闲钱到城里去投资^⑤。特别是考虑到其中的一部分富农,特别是在1948年的富农户数中,还有一部分是由于一部分中农户数因部分家庭劳动力进城工作而出租土地和雇佣农工并因此变成的富农,说明在本来的富农户数中,劳动力的转移比例更少,更说明富农这个阶层在

① 根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93年到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基本没变,指数都为106(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07页);从1933年到1937年,土地荒芜现象严重,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08—920页)。而根据珀金斯的数据,1893年到1933年全国耕地面积增长了约18%(参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第325页)。

② 很多研究认为比之明清,近代粮食亩产量有所下降(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2页);然从1931年至1936年则是稍有增加(参见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第3辑,第926—927页)。从总体上看,粮食单产从19世纪90年代到抗战前夕变化不大。

③ 参见王大任:《市场、权力与资源流失——近代东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探讨》,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3—70页。

④ 张丽:《1929—1948年无锡农村土地出租率和地租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分析》,徐秀丽、黄正林主编:《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59—270页。

⑤ 参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267—270页。

当时是最不愿意离开农村的。

表1 无锡调查11村各阶级劳动力转移情况

		占有土地 (亩)	劳均占有土地 (亩/劳动力)	劳动力数	在外劳力数	在外劳力占劳动力 的百分比
1929年	地主	1997.83	27.00	74	14	18.92%
	富农	1118.75	4.66	240	21	8.75%
	中农	1226.12	2.39	514	47	9.14%
	贫农	1214.27	1.05	1158	129	11.14%
	雇农	0.29	0.03	11	2	18.18%
	其他	104.47	0.79	132	38	28.79%
1936年	地主	2299.17	26.13	88	17	19.32%
	富农	847.79	5.02	169	16	9.47%
	中农	1373.99	2.13	646	72	11.15%
	贫农	900.08	0.79	1143	153	13.39%
	雇农	2.6	0.15	17	1	5.88%
	其他	170.78	1.15	148	44	29.73%
1948年	地主	2354.28	17.18	137	46	33.58%
	富农	597.45	4.78	125	20	16.00%
	中农	1417.17	1.74	814	178	21.87%
	贫农	1150.95	0.93	1235	206	16.68%
	雇农	0.78	0.08	10	0	0.00%
	其他	248.87	1.89	132	49	37.12%

资料来源:《无锡市白水荡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曹庄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东吴塘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龚巷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黄土泾桥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前刘巷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毛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邵巷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苏巷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唐家岩村农村经济调查》,《无锡市张塘巷村农村经济调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内部印刷资料:表1,表7之2,表44。

至此,笔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可以解释“趋中化”现象中“一部分贫农上升为中农”,和“部分中农上升为富农”的现象。然而,农村劳动力的向城市转移却难以解释“地主和富农总体户数的减少,以及地主和富农下降为中农的户数远多于中农上升为地主富农的户数”的现象。这个现象在理论上可以用地主和富农整户迁出到城市来解释,但是在现实中,地主和富农整户迁移到城市在当时的无锡农村少之又少。所以,导致地主和富农户数下降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当初之所以选择无锡、保定进行调查,主要是因为二者都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如果保定农村中贫农的“趋中化”现象也主要是因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所造成的话,那么可以说,1958年一些研究人员所发现的无锡、保定两地农村1949年前土地关系“趋中化”现象中“贫农向中农户数的转变”则主要是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的。

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既有城市就业机会和相对高收入吸引农民进城的原因,也有人口压力和农村经济凋敝迫使农民进城的原因,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无疑缓解了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并为农户家庭带来了一部分现金收入。只是当时的工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足以吸引足够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并在技术和资金上反哺农业,而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格局也不可能使中国的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到那个水平。

根据笔者以前对无锡近代农村农民生活水平变化趋势的研究,从20世纪初到1948年,无锡农民的

人均收入并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①。19世纪下半叶由于欧美丝织工业对中国生丝的格外需求,无锡农民的人均收入曾经一度增长迅速,但这种情景并没能维持下去。由于蚕桑业主要是为欧美丝织工业提供生丝原材料的生产,完全仰靠着国际市场的需求而生活,所以一旦国际市场的大量需求不复存在,这种仰人鼻息的原材料生产便难以生存。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和日本等国的竞争,蚕桑业带给江南农村的繁荣早在20世纪初就濒临日暮了。到西方人在30年代初开始对人造丝进行大规模的商业生产并发明了尼龙以后,原来蚕桑业带给农民的好处便荡然无存。类似的状况同样发生在茶叶、棉花等其它经济作物的生产中。在无锡农村,近代粮食亩产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尽管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减少了农村的人口压力,并给农村带来了一定的现金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并没能能在整体上弥补农户因蚕桑业收入急剧下降所带来的农业生产收入的下降^②。

站在今天的角度,反观近代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土地关系虽然影响到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贫富差距,但平分土地本身并不能解决农村贫困的根本问题。当时中国农村是在整体贫困化,这也表现在“无锡、保定两地,地主和富农下降为中农的户数远多于中农上升为地主和富农的户数”这一现象上。在人口压力大、农业生产停滞甚或下降的境况下,人均土地占有量并不足以提供给农民一个富裕的生活。把中国近代经济放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平等条约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直接经济掠夺和剥削,国际劳动分工和国际不平等交换下发达国家对中国的间接剥削和隐形财富转移,以及在国家政局动乱和官僚买办统治下,高端产业得不到发展,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受挫。土地革命的意义是使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并为1949年后国家集中力量大力发展工业、科技和军工产业打下了实行工业积累和资源调配的所有制基础。

[附记:1986年至1991年,因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事宜,本文第一作者张丽曾多次拜访翰老,并在1986年10月-1991年初跟翰老学习英语。之后,张丽到美国留学,中间几次回国时,都曾想去拜访翰老,但又都因为来去匆匆而没有联系。2004年3月下旬,张丽回国确定工作后,想去拜访翰老,却从网上获悉翰老已于2004年3月13日去世。当时心中除了悲痛和遗憾外,更多的则是愧疚。在此,谨以此文表达我们对翰老的怀念、钦佩和敬仰。]

[参 考 文 献]

- [1] 陈翰笙. 四个时代的我[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
- [2] 岳 琛. 中国农业经济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3] [美]珀金斯.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 宋海文等.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69].
- [4] 许涤新、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5] 张 丽. 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① 详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7章。

② 详见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中华书局,2010年,第7章。